

#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 ——基于唯物史观视域的阐释

桑明旭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围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论述,形成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重大理念。以唯物史观阐释该重大理念,相关探讨必然展开为对如下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追问:(1)当今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具备现实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亟需全人类共同价值予以引领?(3)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用是什么?(5)如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6)“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超越诸如“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价值相对主义”等既有全球发展理念?(7)“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开辟21世纪唯物史观新境界?深刻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我们系统澄清“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的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理论超越性、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哲学贡献,对于推动该重大理念历史实践的平稳有序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百年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围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论述,形成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重大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方位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政治宣言与行动纲领。系统剖析该重大理念,既是当前一项重要理论任务,也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题中应有之义。“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sup>①</sup>,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一切思想理论的时候,都要去深入追问和反思与之相关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以唯物史观阐释这一重大理念,相关探讨将展开为如下递进的五个方面:一是时代前提,即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具备现实基础;二是内在关系,即在阐明

桑明旭,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21512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变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现实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0BZX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的基础上,澄清关于二者关系的核心命题何以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三是具体主张。这关乎“怎么办”,即如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四是理念对话。基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具体主张,与时代对话、与“西方中心论”相关方案对话,阐明其何以能够超越既有全球发展方案,并成为当代全球发展的重大理念;五是哲学表征。在以唯物史观系统阐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之后,反过来深刻分析该重大理念在推进世界历史演进的同时,为何会必然推动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地发展,在哪些方面开辟 21 世纪唯物史观的新境界。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将对如下七个基础性问题展开分析,以系统阐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的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理论超越性、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哲学贡献。

##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具备现实基础?

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一般原理时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sup>①</sup>也就是说,以唯物史观剖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求我们追问当今时代即“百年变局”,在时代深处中发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而这项工作又必然指向对现代性世界历史的内在原则即资本关系的历史性分析。

从当前全球发展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sup>②</sup>。依照唯物史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sup>③</sup>,不仅工人要受到资本支配,连资本家也不过是“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sup>④</sup>。现代性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是资本主体性逻辑,其在发展中始终呈现为实践和理论的双重输出。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的开辟和演进中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局都根植于资本主体性逻辑的调整,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的重大转变——从“暴力输出”到“商品输出”再到“资本输出”,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自由竞争与垄断三个阶段。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在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之所以会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是为了修复危机,另一方面是为了持续积累<sup>⑤</sup>。从“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sup>⑥</sup>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sup>⑦</sup>,再到“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sup>⑧</sup>，“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sup>⑨</sup>,这种输出方式的变化调整为资本缓解增殖危机和持续榨取利润开辟了现实条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⑤囿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危机,如生产过剩危机、生态环境危机、资本过剩危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输出”取代“暴力输出”成为资本主体性输出的主要方式,是资本为了缓解区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需要;“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体性输出的主要方式,是资本为了缓解区域性生态环境危机的需要。固然,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的上述变化,有其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方面的目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忽略或轻视其危机修复的维度。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6页。

⑨《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

件。深度分析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的上述调整过程可以发现,其所进行的危机修复和持续积累是以时空压缩、空间转移为前提的,即通过加快生产和交换的速度、将危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等方式来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这表明,长期以来,资本主体性发展是建立在他者主体性衰退基础之上的。不难发现,过往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演变和危机修复所依赖的都是实体性或地理型意义上的空间和生态条件,这种空间和生态条件在总体上是有限的。但是,在当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深度布展,资本增殖危机发生了从地域性到全球性的重大变化,其结果便是危机修复触及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极限,空间转移逐渐失效,无法继续通过输出方式演变来予以缓解(如生态危机)。当牺牲他者主体性也无法提升自身主体性时,资本主体性遭遇的困境和危机便不再是其造成的后果而是其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也不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性的。这就是“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

资本具有面对增殖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创新的能力,“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sup>①</sup>。面对“百年变局”时代资本主体性的整体性危机,资本必须开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并依托这种创新向多元化、交互化的增殖方式转换,而创新的条件则是其主体性的收敛。在颠倒物化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体性退缩的现实指向不是所谓的“主体性的黄昏”,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共同体公共性的发展。这就是“百年变局”的演进趋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价值增殖是资本的唯一目的,资本总是倾向于采取更快捷、更轻松的增殖方式,“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sup>②</sup>,很显然,相对于以牺牲自身主体性为条件的多元化、交互化的增殖方式而言,传统的主体性输出方式更为直接简便,因而当前一些资本主体性输出大国必然会对抗共同体公共性的发展,甚至表现出极端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资本主体性输出大国的这种逆历史抵抗,造就了“百年变局”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具体呈现为“单一主体—多元主体”“文明输出—文明互鉴”“强制扩张—内涵辐射”“零和博弈—合作共赢”等方面。

正是基于对“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演进趋势与内在张力的认识,我们才进一步明确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的现实基础。这种现实基础具体呈现为递进的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必要性。一方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百年变局”时代全球现代性危机的需要。在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的自我调整无法修复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时候,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发展状态从资本主体性规制的丛林法则转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就成为了时代之需。另一方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百年变局”时代资本逻辑发展的客观需要(被动意义)。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演变本质上是其面对增殖环境变化而进行的创新,当今时代,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难以持续,资本为持续增殖需要进行新的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条件则是其主体性的收敛和交互主体性、公共性的发展。这种交互主体性或公共性,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属性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二是现实可行性。一方面,资本以其主体性退缩为条件所开启的创新推动全球发展突破了实体性条件的限制,这导致争夺实体性资源的冲突可能趋向缓和。任何发展都需要条件,若无法解决全球发展需求无限性与条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无法改变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丛林法则特性。当前虚拟、绿色、可再生的发展条件不断被创造出来,且规模和作用日益扩大,当各个国家不再觊觎有限自然资源而专注自主创新,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单一主体性逻辑就将走向弱化,全人类共同价值和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具备了生产方式基础。另一方面,驾驭资本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证明,不同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同,现代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在发展权上的冲突可以缓解。道理很简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先污染后治理、先旧工业化再新型工业化、先旧城市化再新型城市化、先工业文明再生态文明的阵痛与波折,那么其在发展中必然会与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和走向生态文明的国家产生矛盾,进而影响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弘扬和践行。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所开创和经历的那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种图景,“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sup>①</sup>。这表明,当前各个国家不论其现代化程度如何,都具备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三是具体出场路径。在当前,“百年变局”是各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时代背景,那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口号为何会由中国大声喊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何会在中国率先出场?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位一体”因素决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决定中国在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必然也会肩负起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主体性与公共性(个体与共同体、民族国家与世界)的辩证发展、协同发展实践化、现实化,它既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之上的虚假“普世价值”,也超越了苏联式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在抽象整体本位基础上的僵化“整体价值”,真正赋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真实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公共性观念——开放包容的大同思想、求同存异的集体观念、一以贯之的和平主张、道义为先的价值取向、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等,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代中国出场的文化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苏俄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在其中既不存在“原子化个人”的基因,也不存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sup>②</sup>,“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sup>③</sup>,这种理念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厚重的文化条件。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亟需全人类共同价值予以引领?

在深刻回答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今时代何以具有现实基础这一前提问题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凝炼为如下命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命题内在地包含着如下四个问题: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亟需全人类共同价值予以引领?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三是作为实践形态、过程形态和结果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用是什么?四是如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亟需全人类共同价值予以引领,是人类平稳迈过世界历史“十字路口”的迫切要求。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

<sup>①</sup>《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学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2月12日,第1版。

<sup>②</sup>《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页。

<sup>③</sup>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神生活的过程”<sup>①</sup>,基于此,既然“百年变局”时代的全球大调整、大转换在本质层面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体性逻辑的深度危机及其重大调整、以资本为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危机及其重大调整,那么它也必然在表征层面意味着自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塑造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深度危机及其重大调整。由于生产方式层面的危机是整体性的——前文已经作出论证,因而价值观念层面的危机必然也是整体性的,它囊括了工业资本主义、后工业资本主义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切观念层面的危机;由于生产方式层面的创新和变革是整体性的,因而价值观层面的重大调整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价值观整体框架内的部分调整(如后现代主义置换现代主义),而是超越以资本为原则的“西方中心论”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塑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新的价值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必然呈现为不同于“普世价值”“价值绝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由此可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是当代全球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二者在发展方向上具有同构性、一致性、共生性,正是这种同构性、一致性、共生性,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亟需全人类共同价值予以引领,是前者进一步凝聚共识、克服挑战、开拓新局的必然选择。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在推动全球和平发展、公正发展、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须承认,受到相关因素的掣肘,这一重大倡议在推进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外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理论上,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外理论界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误解。在以大工业资本为原则、遵循以单一主体性为尺度的弱肉强食逻辑的西方现代主义全球治理方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容易被歪曲为脱离现实的主观设想或后工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因为依据现代主义全球治理思想,“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sup>②</sup>,“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sup>③</sup>,全球和平发展、公正发展、持续发展不过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基于“需要的体系”达成的暂时平衡与均势,是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同时,在持有现代主义全球治理思想的论者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公共性逻辑是对个体主体性逻辑的取缔和消解,它意味着“主体性的黄昏”,因而具有一切后工业资本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而在以后工业资本为原则、倡导消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全球治理方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强调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又容易被误读为传统大工业资本的意识形态,推进该理念的相关实践容易被歪曲为新的资本输出形式。这些误解在理论上之所以难以被澄清和回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相关澄清和回应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相关价值观念的理论地平之上,进而进行的理论阐释总是陷入“现代—后现代”“主体性—后主体性”的二元对立之中。因此,面对上述误解及其成因,我们必须拨开西方相关价值观念的迷雾,高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旗帜,澄清主体性和公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思想引领,从而穿透西方意识形态的本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有力的辩护。

从实践上看,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守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浪潮相继涌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新的挑战。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④</sup>因此,在当前,尽管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是在风云突变的时代关口,我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6页。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必须为历史趋势发出时代之声,以时代之声阐明历史趋势,自觉地为历史正确、历史主动大声鼓与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和引领不可逆转的历史实践,在大变局时代凝聚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

###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通过分析上一问题,我们澄清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必要性不等于可行性。纵观人类历史,面对不断发生的战争,很多人都意识到和平发展理念的必要性,比如康德就曾提出了试图一劳永逸解决国家间战争冲突问题的“永久和平论”,但是这些和平发展理念并未能有效引领人类走向持续和平;面对人类对自然界严重破坏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很多人都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比如黑格尔就曾指出,人类不应当也不能够彻底征服自然,“征服自然中的普遍东西,也不能使这种东西服从自己的目的”<sup>①</sup>,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些蕴含绿色发展理念的论述及其思想也未能引领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道路。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分析的问题是:当今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根据唯物史观一般原理,在社会的结构和系统中,价值观念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在受到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重要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②</sup>。因此,从价值观念的这种功能作用来看,作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产物,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着导向、凝聚、约束、激励等作用。从价值的主体视角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既是每一个“现实的个人”,也是作为全球交往基本单元的民族国家,因而其导向、凝聚、约束、激励等作用,不仅体现在世界公民上,也体现在民族国家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推动民族国家在保持合理主体性的同时,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视角,为全球发展寻找最大公约数。

毫无疑问,从唯物史观一般原理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论证仅仅停留在这一维度,那么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具体原因依然是晦暗不明的。因而,必须推动唯物史观具体化,必须深入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时代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层面来展开更加细致的分析。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sup>③</sup>这表明,如果我们要深刻指认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那么就必须阐明三个递进的问题:一是当今时代何以赋予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必要性和现实性?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当代人类发展的哪些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其三,这些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为何必然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来解决和实现?

第一个问题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阐明,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第二、三个问题。我们知道,价值观念来源于现实,是对现实问题的主观反映,尽管价值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价值论不同于认识论,但是就某一具体价值来说,在明确价值主体及其相应的利益关系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它的判断标准。

<sup>①</sup>[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页。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7页。

也就是说,尽管“‘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sup>①</sup>,是指对象之于主体的有用性,但是其在具体语境或条件下也是有判断标准的,即对于特定的价值主体而言,某一对象是否有价值,是可以作出明确判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是全人类,它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对于全人类都有价值,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根植于价值主体所关注的共同利益和遭遇的共同问题。一方面,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关乎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在全球交往普遍化、紧密化的历史背景下,个体发展、民族繁荣、国家富强都依赖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民主自由的国际氛围;另一方面,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也遭遇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引发的经济摩擦、文化冲突、地缘战争等现象层出不穷,这都凸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于人类发展的真实而具体的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人类关注的共同利益和遭遇的共同问题,集中反映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共同期盼,而共同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共同问题的破除和解决、共同愿望和共同期盼的实现,均依托于全人类的共同实践。那种试图依靠某一或某些国家的实践来解决全人类问题的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其本质上只是为了维护某一或某些国家的利益、解决某一或某些国家的问题。在当今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时代,全人类携手维护共同利益、解决共同问题的历史实践必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方案。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上述关系来看,在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是时代和历史的選擇。具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这些价值理念。“和平、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保障;“公平、正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的全球秩序和治理原则;“民主、自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实现的人类生存发展状态。这种内在逻辑的天然一致性,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

####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用是什么?

当今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是辩证的,这种辩证关系意味着,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形态、过程形态、结果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具体呈现为如下方面:

一是旗帜化。在当前,尽管全人类共同价值具备了扎实的现实基础,反映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但受制于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遮蔽与掣肘,还未能成为人类生存发展和民族国家交往的普遍性共识。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因而其所弘扬的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观念,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凡是有助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即是有用的;反之,则是无用的或没有价值的。简言之,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价值在本质意义上是相对于资本而言的,体现着对象之于资本价值增殖的有用性,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sup>②</sup>。正是因为现代性意识形态奠基在资本价值增殖的逻辑之上,因而它的理论形态必然以“主体性”(实为资本主体性)为核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心范畴,强调主体利益至上,强调主体间的关系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强调全球秩序的本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毋庸讳言,面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必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多元冲突的价值体系中高举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力弘扬、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人们切身体会与认可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推动其摆脱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牵引,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旗帜。

二是具体化。全人类共同价值虽然具有现实基础和真实来源并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但它在形态上毕竟是一种观念,具有一切观念共有的抽象性,必须借助具体实体才能将其规定性清晰呈现出来。这个具体实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在当前有关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关系之辨的讨论中,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观念对比等方式来阐释二者在理论主张上的具体差异,进而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实性、现实性、必要性、优越性等作澄清和辩护,但是客观地说,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方式依然缺乏现实的微观基础,因而这种阐释和辩护的力度也是相对不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化的过程,通过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更加准确地厘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差异。

三是现实化。科学的价值观念不仅要深刻反映现实,还要努力转化为现实,而价值观念向现实转化则需要依托于具体实践行动。当今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客观反映了世界历史的演进趋势和人类发展的共同愿景,而这一愿景必须诉诸实际行动才能实现。这一实际行动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就是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不断现实化的过程。

四是规范化。在人类思想史上,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虽然早已被提出,但是始终未能获得规范化的理论形态,其规范化的价值导向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缺少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实践。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倡导的价值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并强势对外输出,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历史实践为“西方中心论”以系统化理论形态强势对外输出提供了现实基础。与之相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化理论形态的形成和规范化功能作用的发挥,寄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中。

五是巩固化。如前所述,虽然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主体性的衰退和共同体公共性的提升,但是在当下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体性与共同体公共性的激烈博弈将持续存在。因此,当今时代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共同问题与特殊问题的矛盾决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与践行也必然会遭遇到各种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sup>①</sup>,这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无疑会起到重要的巩固作用。

六是发展化。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sup>②</sup>,“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③</sup>。也就是说,任何观念都不是先验的,它们都来源于现实并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全人类共同价值也不是一经提出就永恒不变的圭臬,而是要随着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具体的历史实践,它始终根据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局部性变化和整体性变化来调整目标任务,因而必然会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时俱进地发展。

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 五、如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研究阐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如何引领”“怎样引领”是必须讨论的问题。以唯物史观分析该问题,必然将研究视域与核心问题提升到基本立场和重大原则的高度。基于此,我们的分析阐释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部分的递进关系来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一起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全人类共同价值都不能成立。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个有机的观念整体,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上述六种价值的简单排列组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成部分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是递进的。因此,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一方面,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性,我们要整体性弘扬、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程度地满足、维护、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最大程度地应对、化解、消除人类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要将“和平、发展”作为前提性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呼吁全球走和平发展道路;要将“公平、正义”作为“和平、发展”基础之上的全球交往和全球治理的基本准则,坚定不移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要将“民主、自由”作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人类生存发展状态,坚定不移推动人类解放。

其二,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辩证法来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法体现在,一方面强调整体性、共同性、公共性,强调超越单一主体、个别利益、局部问题、地区视野;另一方面尊重合理的个体发展和个别利益,将共同性、公共性奠基在合理的个体性、主体性之上。基于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人类社会和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公共性、共同性,又要注重民族国家的个体性、主体性、差异性,在这种辩证关系上保持合理的张力和平衡。

其三,从人类社会“五位一体”结构及其内在关系来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安全、卫生、军事、国防等共同交织构成了人类社会有机体,因而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须整体性统筹兼顾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方方面面,整体推进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一切事业。我们还要看到,人类社会“五位一体”结构之间不是并列关系,“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①</sup>。因此,在按步骤有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首先应当基于全球产业合理分工、全球资源合理分配、各个国家和地区务实合作,建立“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同时,在高度重视经济层面互利合作、协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层面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作用,焦点问题与核心任务要时刻以全球发展的历史现实为转移。

其四,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辩证关系来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即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当前“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sup>②</sup>,不能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重心外移”;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在“百年变局”背景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不能因当前的核心任务和中心工作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上趋于保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是辩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页。

<sup>②</sup>《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年7月28日,第1版。

证的,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基于此,一个清晰合理的立场和原则是: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起来。

## 六、“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超越既有全球发展理念?

系统阐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不仅需要走进时代深处,基于“百年变局”的历史现实来呈现其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还需要将它置于全球发展理念的思想谱系中加以对话比较以呈现其理论优越性。“百年变局”是当前各民族国家共同面对的历史背景,是各种全球发展理念共处其中的时代语境,那么在多元化、差异化的全球发展理念的谱系中,“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具有深刻的理论超越性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呢?

在思想史上,全球发展理念是人类文明进入世界历史之后才出现的思想观念。在此之前,尽管在相关民族或国家中已经存在某些关于人类发展的思想(如中国先秦诸子的天下观等),但是客观地说,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全球发展理念,因为这些理念的主体并不是人类主体,这些理念的视野也并不是全球视野或世界视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发展理念是一种现代性理念,是世界历史形成、发展及其内在矛盾逐渐展开的观念产物。马克思指出,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sup>①</sup>。既然世界历史是由资本逻辑推动开辟的,那么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也必然会开辟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思想观念,即全球发展理念。换言之,近代以来全球发展理念主要是根植于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纵观近代以来全球发展理念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逻辑规制的全球发展理念依次呈现为“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价值虚无主义”三种主要形态。

“社会进化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快速发展阶段产生的社会思潮,其主张用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为“文明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它和一个胎儿的成长或一朵鲜花的开放是完全一样的。人类曾经经历和仍在经历的各种改变,都起源于作为整个有机的天地万物之基础的一项规律”<sup>②</sup>。基于此,“社会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生物进化规律同样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民族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兴起,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快速发展阶段对于形式上的独立个体和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的需求,反映了率先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将其他国家当作自身发展手段并纳入“普遍有用性”体系的需求。在全球发展层面秉承“社会进化论”,实质上就是为大国争夺发展资源和霸权地位提供理论支持,其后果就是战争冲突频繁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格局的规划,赤裸呈现出“社会进化论”的本质和弊端。二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深度发展,随着全球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日益激烈,资产阶级开始在全球推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普世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普世价值论的哲学基础有二:一是抽象人性论,它由人性共同性推论出价值的普世性;二是形而上学的价值不变论,它由人性的永恒性断定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sup>③</sup>。从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关系的角度来看,尽管人们可以将“普世价值”的渊源追溯到基督教早期教义,但是其真正成为全球发展理念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普遍展开之后,即“普世价值”的现实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发展,“普世价值”的全球推广是资本主义生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8页。

<sup>②</sup>[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7—28页。

<sup>③</sup>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产方式全球推广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征。这也表明,“普世价值”的本质是西方价值,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全球发展理念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发展理念。总体上看,不论是“社会进化论”还是“普世价值”,都属于工业资本主导的全球发展理念,而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严重危机及其后工业转向,“虚无主义”开始流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层面主要表现为“价值虚无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不仅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反对人类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它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sup>①</sup>。“价值虚无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契合后工业资本多元化、差异化、交互化的增殖方式,是后工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表征。从当前全球发展来看,工业资本与后工业资本并存,因而在全球发展理念上,“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价值相对主义”等思潮相互交织。

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置于当代全球发展理念的谱系中加以比较则不难发现,前者对“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价值相对主义”实现了根本性超越。前文指出,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体性的衰退,这表明奠基在追求规模化、同一性、重复性的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义发展理念将逐渐失去效力;但是在世界历史跳出资本现代性框架之前,这种衰退短期内还不是指向民族国家主体性的消解,而是指向民族国家多元主体性的共同发展<sup>②</sup>。因而,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方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把握了时代趋势。由此可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仅超越了现代主义全球发展理念,也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全球发展理念,更超越了长期以来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二元对立模式来分析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的固化思维,这意味着它必然会对“社会进化论”/对立性和对峙性、“普世价值”/抽象性和虚伪性、“价值相对主义”/被动性和虚无性实现本质性超越,从而彰显出深刻的理论优越性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开辟

### 21 世纪唯物史观新境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以唯物史观系统阐释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的若干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反过来,我们还要深入思考如下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在“百年变局”背景下,伴随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的实践推进,唯物史观为何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创新发展?换言之,这一重大理念及其实践何以能够开辟、在哪些方面开辟了 21 世纪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所以能够开辟 21 世纪唯物史观的新境界,首先是因为该重大理念在顺应时代趋势的同时可以引领、推动时代发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现实发展必然推动时代精神创新,进而推动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发展。在“百年变局”时

<sup>①</sup>[德]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400 页。

<sup>②</sup>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37 页)“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74 页)因而,在资本逻辑尚未自我扬弃的现代性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交往的基本单元。当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交往关系也是不断发展的,其在当今时代则呈现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发生在现代性世界历史阶段,但是它也深刻昭示着人类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阶段迈进的必然趋势。

代,时代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是其内在原则从资本主体性转向共同体公共性,这将“公共性”及其相关问题诸如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精神、公共秩序、公共空间、公共价值、公共信任等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论域。其次,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唯物史观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自我变革的功能。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①</sup>。因此,唯物史观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总是会随着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发展。也就是说,“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所以能够开辟21世纪唯物史观新境界,是该重大理念的功能作用和唯物史观的内在品质使然。当然,这种新境界的具体理论呈现依然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分析概括,这也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任务。

具体而言,这一使命任务包括:在基本原理方面,一是重新阐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唯物史观中的定位,阐明公共性理念在以批判、对抗、斗争为传统话语的唯物史观框架内如何安置;二是基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大理念的实践,重新阐释交往实践与主体性、公共性的关系,揭示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三是基于该重大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在新时代方位研究全球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思以资本逻辑为原则的旧全球化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书写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原则的新全球化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四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形态,细化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发展观方面,一是反思近代以来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整个发展哲学理念(以资本为中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新厘定发展的主体、动力、前提、秩序、目的、意义等基础问题;二是重新阐释现代化、现代性的一般规定性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定位;三是追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现代性世界历史阶段是否存在不同于资本现代化的新现代化道路;四是阐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何以推动全球发展走向一条不同于资本现代化的新现代化道路。在公正观方面,一是系统阐释该重大理念的政治哲学意蕴,厘清“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唯物史观中的基本内涵;二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以新的实践深刻澄清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关系问题;三是在该重大理念的具体实践基础上,深刻说明唯物史观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四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历史实践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全球正义观,破解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正义问题上的失语局面。在文化观方面,一是基于该重大理念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阐释文化的公共性及其功能机制;二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法,阐明文化的多元性、共同性、公共性与文化的差异性、个体性、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三是基于该重大理念的新实践,澄清多元化、差异化的文化通过对话互鉴生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性及其内在逻辑;四是阐释多元文化交汇交融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逻辑关联。在价值观方面,一是以唯物史观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若干基础问题进行阐释,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二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法,在新时代方位对共同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关系等价值哲学重大问题作出新阐释;三是基于该重大理念的历史实践,拓展价值观的研究视域,在主体性视角上辅以公共性视角;四是在“普世价值”批判、“价值绝对主义”批判、“价值相对主义”批判等领域开展出新成果,等等。此外,“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还将有力开辟出唯物史观在经济观、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科技观、生态观、自由观等方面的新境界,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一展开论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从“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和演进趋势来看,还是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来看,抑或是从唯物史观具体内容的上述发展来看,从资本逻辑向共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同体逻辑转换、从单一主体性向多元主体性或公共性转换都有一条清晰主线,这昭示着当代唯物史观创新的基本方向:走向 21 世纪的交往实践唯物主义。

(责任编辑:陈 雪)

## **Fundamental Issues i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uided by Common Human Values: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ANG Mingxu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has made significant statements regarding “promoting the propagation of common human values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has formed a significant concept i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terme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uided by common human values”. Interpreting this significant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reflection on and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following fundamental questions: (1) In the present era, what constitutes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common human val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2) Why is it essential for common human values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3) How can common human values effectively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4) What role 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play in promoting common human values? (5) How can we use common human values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6) How does the significant concept of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uided by common human values” transcend the existing global development concepts such as “social evolution theory”, “universal values”, and “value relativism”? (7) How does this great concept open up new frontiers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roviding profou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is of paramou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feasibilit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glob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ignificant concept and for promoting its smoo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ractice as well.

**Keywords:** common human values;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bout the authors:** SANG Mingxu,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searcher at China Urb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